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28

2009年5月15日

論全球化、解放思想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高梁

我國經濟體系過深捲入全球分工的格局，對外資過分依賴，已成為產業結構優化昇級的障礙。

破除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迷信，走自主型發展道路，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任務。

一、金融風暴和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殃及世界各國，造成了世界性經濟衰退。金融危機也從根本上動搖了以“華盛頓共識”為基本標識的意識形態權威和制度迷信。

多年來，美國依仗美元特權地位，縱容資本市場過度發展，

在國內工業經濟衰微、儲蓄傾向一降再降、鉅額債務纏身的情況下，以“金融創新”手段，從全世界聚斂財富，支撐龐大的戰爭費用和國內超前消費。美國製造的超級金融泡沫的崩潰，標誌著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各國人士譴責美國縱容金融泡沫膨脹的政策為“金融欺詐”，是“讓所有人分擔由少數人無盡貪婪帶來的負擔”（巴西總統盧拉）；各國政要紛紛呼籲改革國際金融秩序。我們可能正在進入國際金融和經濟格局的轉折點。

美國政府由於疏於監管導致金融泡沫膨脹和崩潰，政府出重手向重要金融機構注資，宣告了流行多年的“市場至上、政府管制最小化”迷信的破產。“華爾街被自己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搞成如此的狼狽不堪”。經濟學教科書將因此而重寫。各國精英紛紛反思：“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潘基文在聯大講話）；危機標誌“金融資本主義強加在經濟領域的關於全球化理念的失敗”；其原因“不僅是因為華爾街的銀行家們缺乏遠見和道德意識，更是因為華盛頓政府……將市場奉為神靈，並盲目希望將這一模式擴張到全世界”（德國前總理施密特）。金融大鱷索羅斯從金融市場“追漲殺跌”折射的信息不完整規律，指出基於理性選擇的市場均衡理論是“對現實世界的扭曲”。（那種認為）“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薩科奇）。

改革開放 30 年，國內一些人向來把美國視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範本”，主張照搬華爾街模式、開放金融市場、“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也不乏其人。金融危機明白揭示了全球化的陷阱和挑戰。“老師”做得不見得都對。“一定要打破對外國銀行、金融

市場的迷信”¹。

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使我國金融資產縮水、出口受阻、增長和就業遭受重創。危機使我國經濟發展中一些根本性的弱點顯著化，需要我們研究新自由主義傾向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影響，這對我國的長期發展，關係極大。本文擬重點探討：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多年來，以“私有化、市場化、政府干預最小化”為關鍵字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我國知識界有相當的市場。西方標準的“完全市場經濟”能否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最優目標？

二、經濟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問題。所謂與全球市場體制“接軌”、按比較優勢原則“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出口導向戰略，是否符合我們的長遠利益？怎樣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緊迫性？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是不是意味著要將某些人堅持的“完全市場化、融入全球化”思維定式貫徹到底？

改革開放 30 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輝煌，有目共睹。但是，近 20 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必須加以正視。輝煌成就不是迴避矛盾和問題的理由。我們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有關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方面問題澄清認識。只有正視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消極影響，劃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界限，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障礙，才能使國家未來的發展能夠持續地、健康地向前推進。

筆者就上述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供批評指正。

¹〈建行董事長郭樹清：一定要打破對外國銀行、金融市場的迷信〉，易富網 2008 年 10 月 7 日（<http://www.eefoo.com/plus/view.php?aid=1047041>）。

二、當前我國發展中的一些突出問題

(一) 產業格局和分配格局：對出口、投資和外資的過分依賴

我國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時期。市場化改革提高了微觀活力，對外開放和實行“國際大循環”戰略，開拓了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的渠道。我國上百種工業產品的產能產量居世界前列。² 億萬農民工跨區進城就業，我國城鎮化率從 1995 年的 29% 增至 2007 年的 45%，沿海地區已經形成了若干面向國際市場的鉅型工業城市帶。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目前我國發展存在一系列問題：國民經濟總量中外貿和投資比例過重，內需不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發達國家強勢競爭的壓力；民主法制建設不適應；等等。

我國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國外市場和國內投資品市場的拉動。這既決定了我國工業的結構特點，也是國內分配格局失衡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這一增長格局，不僅影響宏觀經濟的短期表現，也是影響結構優化昇級戰略任務的系統性消極因素。

2003~2007 年，我國投資和出口的年均增速達到 25~28%，同期國內消費增長僅為 10% 左右。居民消費比例從 1978 年的 48.4%，下降到 2006 年的 36.4%。出口加工和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是主要

² 例如，我國鋼鐵、煤炭、水泥、合成纖維、銅鋁鉛鋅等十種主要金屬產量居世界第一，發電裝機容量和造紙世界第二，合成橡膠、造船、汽車產能世界第三，煉油和乙烯產能世界第四。集裝箱產量佔世界一半以上。纖維加工量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強。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風扇、電鍋等產量佔世界市場 20% 左右；豬輕革高檔產品佔世界的四分之三，皮鞋佔世界三分之一；縫紉機佔世界二分之一。自行車出口佔全球貿易量的三分之一，羽絨製品佔世界二分之一，玩具佔美、歐市場的 40~50%（2004 年）。

的需求板塊。在佔 GDP 總量 52% 左右的投資中，基礎建設佔 72%，房地產又佔基礎建設的 30% 左右（2007 年）。這是拉動重化工業擴張的主要因素。

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外貿依存度達到 60~70%，出口依存度從 1995 年的 20.5%，上昇到 2006 年的 37.1%，這在一億人口以上的大國中絕無僅有。依賴國際市場的程度，相當於德國、韓國等中等規模的外向型工業化國家。

表~1：若干國家經濟總量和外貿依存度（2007 年）（單位：億美元）

	GDP	進口	出口	進出口總額	外貿依存度
印度	10989	2167	1452	3619	32.9%
日本	43838	6210	7128	13338	30.4%
韓國	9571	3566	3716	7282	76.1%
新加坡	1613	2632	2993	5625	348.7%
美國	138438	20170	11632	31802	23.0%
阿根廷	2600	448	559	1007	38.7%
法國	25603	6132	5522	11654	45.5%
德國	33221	10594	13265	23895	71.9%
俄羅斯	12296	2231	3552	5783	47.0%
英國	27726	6172	4356	10528	38.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2008》。

對國際市場的過份依賴，使我國工業的相當部分（輕工紡織、電子裝配等）“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成為跨國公司的製造基地。我國製造業產值的 30% 以上用於出口，出口值近 60% 由外資企業完成，加工貿易佔出口額 50% 以上（2007 年）。

我國出口額的 89%，由佔經濟總量 55% 的東部地區完成。東部地區已形成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工業帶，外貿依存度達到 96.5%。這是實行多年的“沿海大循環”戰略的成果。相比之下，中、西部外貿依存度為 11~12%，東北地區為 28.3%。³ 沿海地區作為我國

³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2008》，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8 年，第 18 頁。

經濟增長的引擎，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資經濟的高速增長。

表~2：沿海十省（市、自治區）外貿依存度與外企對外貿的貢獻（2007年）

	地區 GDP (億元)	進出口(按目的地 貨源)(億美元)	外貿 依存度	其中外企進出 口值(億美元)	外企進出口/ 全部進出口
遼寧	11023.5	651.80	44.9%	313.11	48.0%
天津	5050.4	755.64	113.7%	541.24	71.6%
河北	13709.5	344.72	19.1%	104.85	30.4%
山東	25965.9	1408.01	41.2%	665.57	47.3%
上海	12188.9	2738.70	170.8%	1931.35	70.5%
江蘇	25741.2	3722.47	109.9%	2800.52	75.2%
浙江	18780.4	1991.99	80.6%	710.73	35.7%
福建	9249.1	752.90	61.9%	462.43	61.4%
廣東	31084.4	6524.14	159.5%	4082.19	62.6%
廣西	5955.7	104.67	13.4%	28.90	27.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2008》。

外資不僅成為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而且在工業中的比重逐年增長，其勢力逐漸深入到我國經濟的核心部分。“三資”企業約佔工業資產存量的 30% 和增加值的 32%（2007 年），其中港澳臺資本佔外資存量的三分之一。在工業所有行業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多數企業中已擁有股權控制權，⁴ 控制著投資、國際購銷、財務、研發等經營實權，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觀。

我國 39 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 19 個行業的銷售額已超過 30%，其中，“其他採礦、皮革羽絨等加工、傢具、文體產品、電子、儀錶”六行業的銷售額佔 50% 以上絕對優勢，在服裝、橡膠、塑料、電器設備等重要行業的銷售額也佔到 40% 左右。⁵ 外資通過投資併購佈點，在越來越多的工業分支領域，形成由外資主導的寡頭競爭（如飲料、啤酒、化妝品、肉製品、水泥）或壟斷局

⁴ 李孟剛、蔣志敏、李文興：〈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新浪網 2006 年 6 月 13 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3/13532647261.shtml>）。

⁵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 2006》，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 年，第 62~95 頁。

面（如乾電池、小五金製品）。

表~3：外資工業企業在我國市場的佔有率

年份	外資工業企業 銷售收入（億元）	全國工業企業 銷售收入（億元）	外資市場 佔有率（%）
1993	3290.77	38084.13	8.64
1995	9022.61	52936.21	17.04
2000	22545.74	84151.75	26.79
2004	57831.51	187814.77	30.79
2007	127629.31	405177.13	31.50

資料來源：李孟剛等：〈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新浪網 2006 年 6 月 13 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3/13532647261.shtml>）；2007 年數據由作者引自《中國統計年鑒 2008》，口徑為工業產值。

表~4：外資在若干行業的市場佔有率（2006 年）

行業	全部工業產 值（億元）	外資工業企業 產值（億元）	外資市場 佔有率（%）
紡織服裝、鞋、帽製造業	7600.38	3430.45	45.1
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製品業	5153.49	2587.06	50.2
傢具製造業	2424.94	1137.12	46.9
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	2098.79	1285.24	61.2
塑料製品業	8120.41	3206.69	39.5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27147.40	12364.77	45.5
通信設備、電腦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39223.77	32966.71	84.0
儀器儀錶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製造業	4307.99	2707.00	62.8
工藝品及其他製造業	3387.71	1294.73	38.2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2007》。

（二）我國經濟已過深地捲入國際分工體系，其負面作用日漸顯現

一是經濟結構的失衡。我國在低端產業（或加工環節）高度依賴出口的同時，投資品和高技術產品愈加依賴進口、依賴外資。對外資進口裝備的種種優惠政策，嚴重衝擊本國市場。多年來，進口設備佔領了三分之二的國內市場，相當於 GDP 的 8%。2003~2007 年資本品市場購銷兩旺，國產裝備市場佔有率昇至 50% 左右。金融海嘯一來，本國裝備工業再次面臨嚴峻局面。

我國已成為“世界車間”，同時又是一個科技弱國和品牌小國。通過開放引進，我國經濟的技術含量不斷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並沒有縮小。我國企業銷售額中新產品比重約為 10% 強，甚至落後於一些發展中國家。我國全部研發經費投入約為美國的 5% 和日本的 9%，發明專利授權僅相當於美日的 30 分之一和韓國的四分之一。工業企業的自主技術進步能力差，不足以支持產業的昇級。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 60%、出口的近 90% 由外企完成，徒有虛名。⁶

二是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價值鏈中的低端地位。沿海出口加工業多年高速成長，其市場開拓多依賴“借船出海”，本國企業跨國行銷的能力卻沒有成長並形成大企業，中國廠商只得到全球價值鏈中微薄的加工費。全球產業鏈中最“肥”的環節——研發設計、訂單管理、產品儲運、跨國行銷、金融服務等，大體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各方信息表明，OEM 貼牌生產廠商總收益，僅佔產品全球價值鏈的 10% 左右。我國沿海工業帶的崛起，與西方服務業佔 GDP 比重同步提高，絕非偶然。⁷

三是國內分配問題。內需不振，居民消費佔 GDP 比重從 1978 年的 48.4%，下降到 2006 年的 36.4%。收入差距過大是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國的基尼係數從 1984 年的 0.24 急劇擴大到 2004 年的 0.469，貧富分化的速度世所罕見；最高收入 10% 的富戶財產佔全部居民財產的 45%，而最低收入的 10% 的窮戶的財產僅佔 1.4%，兩

⁶ 例如，由於缺乏自主核心技術，須將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 20%、電腦售價的 30%、數控機床售價的 20~40% 拿出來向外國支付專利費。

⁷ 過去近 20 年，美國 GDP 中的製造業比重，從 20% 降至 11%。我國有人照搬“國際標準結構”，也要照此標準大力發展三產。他們忘記了今天是全球化時代，西方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高端服務業”興起和發展中國家加工業成長是同一過程。況且三產是高度市場化的產業，不是通過政府命令壯大的。

者比例約為 32 比 1。⁸ 佔全國家庭總數千分之一的 31 萬戶家庭，控制了全國 41.4% 左右的金融財富，⁹ 意味著 90% 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長，沒有能夠和經濟增長同步，從而造成“高增長和有效需求不足並存”現象。

勞動者工資總額佔 GDP 比重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美日英德等發達國家的這一比率在 54~65% 之間，我國職工工資和福利佔 GDP 比重，從 1992 年開始就逐年下降：

表~5：我國職工工資福利佔 GDP 的比重 (%)

年份	工資與 GDP 之比	(工資+福利)與 GDP 之比	年份	工資與 GDP 之比	(工資+福利)與 GDP 之比
1978	15.70	20.41	1995	13.85	18.01
1980	17.10	22.23	1998	11.87	15.43
1985	15.43	20.06	2000	11.91	15.48
1990	15.91	20.68	2002	12.51	16.27
1992	14.79	19.22	2003	12.57	16.35

資料來源：王煉利：〈GDP 和低工資中的學問〉，烏有之鄉網站 2006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22/200606/7423.html>) 。

我國的低工資水平和較高的勞動力素質，是發展加工出口所依託的主要競爭優勢。但產業結構過於偏向出口加工，又成為維護國內低工資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以致《勞動合同法》遭到強烈反彈。初次分配不公平導致國內消費不振，但維護出口加工業又是“保八”的重要條件，不得不向國內外資本利益讓步，處境尷尬。

由於國內消費需求長期跟不上人均 GDP 增長，向投資傾斜就是唯一出路。我國超過 50% 的投資率，也是世所罕見。於是房地

⁸ 李成瑞：〈大變化 — 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複雜性分析〉，中安論壇 2007 年 8 月 31 日 (<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288889-1-1.html>) 。

⁹ 〈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數量位居全球第五〉，新華網 2007 年 10 月 3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30/content_6975867.htm) 。

產、基礎設施和各地方樓堂館所，就持久地成為“支柱產業”，成為鉅大的重化工產能的出路。

根據再生產理論，產業結構與分配結構必須相互適應，這是社會產品實現的必要條件。這種適應關係是在特定的運行機制下，長期磨合形成的。產業結構失衡，與分配結構失衡是互為表裡的。這一格局是捲入全球產業分工的產物。

三、30年經濟運行機制的演變和出現的問題

（一）經濟體制和發展機制的重要變化

1990年代以來，在市場化外向化快速推進的同時，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分配從（行政影響的）按勞分配為主，轉變為“按要素分配為主”，我國由改革初期的內生驅動型增長，遂演變為當前外資主導的出口導向型、投資拉動型增長。

1、所有制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本質變化

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決定性成果。目前，以股份制為特徵的新型國企管理體制已經建立，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到位。

30年高速增長中，非公有經濟成分急劇增長，公有經濟比重降到三分之一左右。我國工業已形成國有、“三資”、民營“三分天下”的局面，國有經濟僅在基礎性行業中佔絕對優勢，在流通領域中，國有經濟僅佔10%左右。¹⁰

¹⁰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計算，2006年，二、三產業的公有制經濟（國有+集體）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是：資本為48比52；就業為32比68，國內生產總值為37比63（李成瑞：〈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複雜性分析〉，中安論壇2007年8月31日，<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288889-1-1.html>）。又據劉日新計算，扣除股份制企業重複部分，國有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已降至

表~6：三種經濟類型工業企業的主要指標和變動（1998~2006年）

	企業數		從業人員		工業產值		總資產	
	2006年 (萬個)	06/98 倍數	2006年 (萬人)	06/98 倍數	2006年 (萬億元)	06/98 倍數	2006年 (萬億元)	06/98 倍數
國有	2.50	0.38	1804	0.48	9.89	2.94	13.52	1.81
民營	14.97	13.99	1971	12.25	6.72	32.00	4.05	27.00
三資	6.09	2.31	2118	2.73	10.01	5.96	7.71	3.62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

這一過程伴隨的副作用是：隨著非公經濟、特別是外資勢力急劇擴張，國內市場競爭環境惡化，國企自身體制的弱點未能及時克服，企業效益普遍滑坡，經營陷入困境。在一段時期內，國企改革演化為全國性的“國企改制、退市”風潮。在十幾年中，約70%的國有企業通過破產、兼併和股份化民營化形式退出。

國企體制改革和結構佈局調整，實屬必要。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無視中央反復申明的“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精神，高調宣揚“國企必敗、國退民進、一賣了之、腐敗有利於推進改革”等片面或錯誤主張，造成化公為私、監守自盜現象普遍，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1995~2005年，累計約4200萬國企職工和1500萬大集體職工下崗，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國企改制腐敗成為社會腐敗的重災區。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由於其企業數的五分之一和資產的三分之一來自於“灰色”途徑，而蒙上了“原罪”的污點。¹¹一些官員和學者聲言要“最大限度容忍改革中的不規範”。對腐

15.3%（劉日新：〈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世界之最〉，烏有之鄉網站2007年12月22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712/29407.html>）。

¹¹ 據〈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綜合報告〉，現有全部465萬戶私有企業中，94萬戶企業是由改制、收購原國有、集體企業而發展而來，佔全部私企的20.3%。據分析，私營企業近七萬億實有資本中，來自原國有、集體企業的資產約佔三分之一（〈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綜合報告（節選）〉，商務部網站2007年2月16日，<http://anhui.mofcom.gov.cn/aarticle/sjdixiansw/200702/20070204390611.html>）。

敗的放任和縱容，激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危害社會穩定、降低政府威信。

從宏觀角度看：改革初期，我國尚處於短缺經濟狀態，由於舊的“大鍋飯”體制未打破，企業擴大自主權後工資增速過快；地方財權事權擴大，普遍出現投資熱和重複建設。當時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投資消費雙膨脹”的壓力。1990年代後，隨著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和市場化程度提高、城市失業率上昇，以及城鄉間人員流動藩籬的消除、億萬農民工進城，工資水平全面壓低。我國製造業職工報酬支出與經營盈餘（增加值－全部報酬）之比，1990年為1比3，2000年為1比4.7，2005年降至1比7.6。相比之下，世界多數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1比1到1比2之間（1980年）。

表~7：中國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製造業產值構成¹² (%)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3	2005
中間投入佔	73	74.9	73.8	73.2	74.1
報酬支出佔	6.6	5.8	4.6	3.7	3
經營盈餘佔	20.4	19.3	21.6	23.1	22.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報酬與盈餘之比	1比3.1	1比3.3	1比4.7	1比6.2	1比7.6

資料來源：王煉利：〈提高勞動報酬，著力於初次分配——剖析製造業的勞動報酬問題〉，博客中國網2007年12月21日（<http://www.blogchina.com/20071221445482.html>）。

這樣，在經濟高速增長、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逐步昇級的同時，形成了典型的“產能擴張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完善社保體系，對擴大內需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根本問題在於改善一次分配的格局。

¹² 表~7的計算方法如下：

中間投入佔總產值比重 = (總產值 - 增加值) / 總產值 × 100；

報酬支出佔總產值比重 = 報酬支出 / 總產值 × 100；

經營盈餘佔總產值比重 = (增加值 - 報酬支出) / 總產值 × 100。

有人說，貧富差距擴大主要是腐敗和行業壟斷所造成，不應歸咎於市場體制。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問題，我國貧富急劇分化至少有以下原因：（1）體制轉軌中的腐敗；（2）私有經濟膨脹；（3）大量農民進城尋求就業；（4）國際資本大舉進入。我國的一次分配，是在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的環境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力價格”為基準墊底的。內外差距、城鄉差距的雙重“二元結構”，形成資本與勞動的地位極不對等的“要素市場”。所有制格局決定分配格局，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是基本的經濟規律。

2、政府行業管理職能弱化，產業和技術進步政策缺乏依託

改革傳統計劃體制、減少政府對企業過多的干預，是搞活經濟的必要條件。目前指令性計劃體制已不復存在。但這一過程中的問題是，由於過分強調“小政府大社會”、貶低政府的經濟綜合管理和行業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應的管理職能不斷弱化，甚至一度違反工業運行的客觀規律，取消了政府的工業管理機構，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骨幹企業也交地方管理。

當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多元決策局面已經形成。儘管“政企不分”體制已經改革，但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相當程度上形成“受地區行政干預的市場”和“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局面。工業結構內的有機聯繫與合理整合仍受條塊體制的干擾。

我國工業處於後進追趕階段。總體上看，我國工業規模龐大，企業數量衆多，企業規模偏小，行業集中度低，組織程度差。多數企業技術水平低，缺乏技術研發的能力與意願，局限於低成本的競爭。各地區畫地為牢、爭項目爭外資，惡性競爭，低水平重複。過分強調國內競爭，忽視企業協同與產業整合，我國各行業

組織幾乎成了一盤散沙，在跨國公司的競爭和產權侵蝕面前幾乎沒有還手餘地。

由於部門地方利益分散化，行業管理軟弱無力，國家的產業和科技進步規劃與政策，在實施中障礙重重。高能耗高物耗行業的重大關鍵技術研發推廣不力，導致工業的“高投入、低效益”和環境污染久治不愈。我們對全球橫行的跨國資本敞開了市場，而本國行業內卻難以協調，無序競爭，損失慘重。我們作為頭號鋼鐵大國，鋼聯無力抵禦鐵礦石出口國的一再無理提價。各地方大量壓價出口戰略性稀有金屬，中央屢禁不止，使我國作為頭號稀有金屬大國的戰略優勢喪失殆盡。

地方政府為保持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競相分頭招商引資。我國若干重要產業已經被多個跨國公司“整合”進各自的全球體系，國內競爭成為外資代理人的競爭。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為推進“國企攻堅”，紛紛將下放本地的原中央戰略性骨幹企業向跨國公司掛牌出售，直接損害國家安全利益。

3、對外開放缺乏內外統籌和開放度的把握

為全面準確地理解中央有關對外開放的精神，特摘錄有關文件表述如下：

（1）“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¹³“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¹⁴

（2）“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

¹³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726頁。

¹⁴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1348頁。

置……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發展開放型經濟”；¹⁵

(3) “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提高利用外資水平”；¹⁶

(4) “注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提高”；¹⁷

(5) “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係，維護國家經濟安全”。¹⁸

實際中，只有“擴大利用外資規模”貫徹最積極，成效最顯著。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政府為解除外商疑慮，給予外資諸多優惠政策，同時還設定了若干保護國內市場的限制條件。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對外商投資的各項限制條件（准入行業、股比、內銷比、技術轉讓）放寬或取消。同時對外資的普惠性稅收優惠卻繼續保留多年，等於對內資企業的長期歧視。

在1980年代“沿海大循環戰略”的示範下，多數省市以GDP為目標、以招商引資和“經營城市”為主要途徑，形成“開發區熱”和“引資熱”。各地爭相出臺低地價、延長地稅減免期等土政策，甚至向下硬性攤派招商引資任務。這個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招商引資運動，既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也是形成“重

¹⁵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744頁。

¹⁶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1355頁。

¹⁷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1355頁；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272頁。

¹⁸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905頁。

外貿、重投資、內需不足”發展模式的主要動因。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兩面。多年來我國堅持開放國策，激勵了國內市場體系的形成、引進了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推進了工業高速增長。但是，隨著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外資在華勢力不斷膨脹，其負面效應逐漸增大，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擴大開放不能沒有底線，開放必須服從國內發展的根本利益。

我國早已是世界外資第二大流入國。1979~2008年，我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8500億美元，是日本戰後半個多世紀吸收外資的至少十倍。近年來每年外商直接投資800~900億美元（佔總投資5%左右）。目前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佔GDP比重達到21%，已達到發展中國家水平的上限。在工業領域，扣除港澳臺資本後，外資份額也已達到20%以上，外資比例若繼續提高，必將削弱國家宏觀調控的效力，甚至干預國家政策的案例也不鮮見，這意味著威脅國家經濟主權。¹⁹

“入世”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中獨資比例迅速攀升至60%以上，外商獨資企業不承擔轉讓技術的義務，且技術保密能力更強，指望“市場換技術”或“技術溢出”越來越成為幻想。

綜合上文，外資過分擴張的負面效應還有：

第一，偏重外貿外資，使我國與各發展中國家處於競相壓低要價、吐血引資的尷尬處境。我國工業的相當部分處於全球產業鏈低端，長期以低工資、廉價土地資源能源和沉重的環境代價，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產品，僅拿到全球價值鏈的零頭，等於犧牲

¹⁹ 我國加入WTO後，UPS、FedEx等四大國際快遞鉅頭，已佔領中國國際快遞業務市場的80%，並計劃佔領國內快遞市場。2005年四鉅頭代言人亞太國際速遞商協會發表聲明，要求郵政分業經營，改革政策透明，讓國際快遞、物流商發表意見，企圖染指我國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信函業務。2005年，54個在華跨國公司試圖阻撓“兩稅合一”也是個突出案例。

國人及子孫後代的利益，用“打工經濟”補貼西方的“知識經濟”和“賭博經濟”。洋人賺足了錢之後再回來收購、控制我國產業，還得寸進尺、得便宜賣乖。²⁰

第二，經濟過分外向化和過分依賴外資，成為分配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在國際資本面前，本國勞動處於絕對弱勢。“企業高管薪酬向跨國公司看齊、底層工資向農民工看齊”，拉大和固化國內收入差距鴻溝，壓抑社會消費需求。

第三，過分依賴“讓市場換技術”（換技術已越來越成為空話），導致社會對外國技術的盲目崇拜，高端產品市場被外資和洋貨長期佔據，壓抑本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意志，成為本國產業昇級的障礙。長期靠“比較優勢”吃飯，還滋長了依賴洋人搞工業的心理，不思進取，思想僵化。

第四，對外資總量擴張和外資對我經濟命脈及核心、戰略性產業的市場擠佔和產權侵蝕缺乏制約，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以下就有關產業結構的幾個重要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二）產業結構優化昇級面臨系統性障礙

1、開放過度，產業和技術自主進步能力被壓抑

我國工業的核心部分——裝備工業和各類戰略性高技術產業，是我國60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積累的家底，是綜合國力和國防安全的基礎，也是未來產業昇級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西方“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強勢競爭，我國裝備工業和戰略性高技術產業總體上處於被動地位。企業的

²⁰ 綜合多方報導：外資企業通過收取專利費用、跨國購銷轉移收益等手段，將大部分收益收入囊中。稅務總局2005年調查，外資實際稅務負擔約11%，僅相當於國有企業的一半；約50%外資企業虧損，其中至少一半是假虧。所謂外資“拿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看來並非虛言。

市場空間被一再壓縮，科研成果產業化困難，體制和政策環境也妨礙本國企業提高技術競爭力。處於弱勢的分散的企業，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和吞併的威脅，單打獨鬥。

行業管理缺失，再加上科研體制改革“一刀切”（原各工業部的開發類院所全部企業化），削弱了行業共性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能力，反而不利於科技與經濟的結合與產業優化昇級。地區間為爭投資、爭招商引資、爭速度而彼此競爭，妨礙企業間的技術交流和協同研發。行業缺乏有效措施進行引進技術設備的吸收消化推廣。在需要行業級攻關的技術領域——系統設計、關鍵分系統、零配件、元器件和生產設備等方面，形成對外國產品和技術的嚴重依賴。引進復引進，亦步亦趨。

在此形勢下，企業普遍追求短期利潤，“重引進輕消化、重生產輕研發”。我國企業總引進費用與配套消化費用之比為 1 比 0.0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0% 和日韓的 1%。僅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

2、對合資引進的依賴：缺乏根基的產業昇級

近十幾年隨著居民消費昇級，產業結構也在逐步昇級，如 ICT 產品、家電更新、家用汽車、住房等，以及相關的資本品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擴張和昇級。這一昇級過程，很大程度得益於引進外資。有人據此證明，外資具有內資所不具備的技術進步牽引作用，我國引進外資規模還應該擴大；有人根據我國 50% 以上技術來自國外這一事實，主張放棄自主科技創新的努力。

先讓我們看兩個行業的實例。

數控機床：加工設備自動化是工業結構昇級的根基。我國在此領域起點較差，1990 年代 80% 依靠進口，高端數控機床的進口受到西方嚴密封鎖。1999 年“考克斯報告”指責“中國借中美幹

線飛機合作項目，進口美國數臺五軸多聯動數控機床，轉為加工軍品”，還派人來華追查。從 1990 年代起，國有民營一起上，在整體設計和核心的數控系統方面形成突破。現在，我國瀋陽、大連、齊二機床及華中理工等單位已能自行研製多款中高端產品，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 50% 並出口，西方封鎖不攻自破（還有很多技術瓶頸需要協同攻關）。

程控交換機也是在外國封鎖下自力更生的產物，對我國有線電話的普及居功至偉。

家用汽車：中國已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家用車市場，汽車工業是我國下一階段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但是這一產業的主體掌握在外資手中。各省爭找跨國公司聯姻，搞“市場換技術”，國內產能 70% 以上被各大跨國公司參（控）股整合，整車和主要分系統、零部件的研發設計製造核心技術，大部分還是由外方控制，汽車利潤的大部分回流到各跨國公司總部。國家的產業政策成為一紙空文，只有政府部門對夾縫中成長的、堅持自主發展的地方汽車企業給以有限支持。

有人總結：凡是外國封鎖的技術，自己就能搞起來，凡是能從外國引進的技術，自主創新就垮臺。這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與後進追趕國家間的技術封鎖反封鎖、遏制反遏制鬥爭。西方資本為利潤所驅使，將低利潤的產業環節向後進國家轉移，但同時又竭力保有技術優勢，防止核心技術隨產能的轉移而外泄，為此不惜動用國家力量。他們的基本策略是：對核心及戰略高技術嚴格封鎖，通過選擇性技術出口策略，摧毀後進國技術自立的能力和意志、壓抑其自主技術產業化的努力。²¹ 全球化

²¹ 例如，西方國家曾對我高端數控機床嚴格限制出口，一旦我國自主研製獲得突破，立即解除相應出口禁令，以圖將我數控機床產業扼殺在起步階段。此類案例數不勝數。

時代的技術轉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國際政治問題。西方對我國的技術封鎖、遏制和打壓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此我們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從全局看，我國目前的“產業昇級”，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以外資企業為主體的產業昇級。我國的發展模式如果和東南亞、拉美國家有什麼區別的話，本質區別在於我國還保有一個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有一定規模和技術實力的資本品產業和高技術產業。

過分依賴外資的發展路徑，是30年來歷史地形成的。這一發展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與合理性。但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其最大的危害是，被動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獲得眼前的增長利益，要以出讓市場和產業控制權以及未來的發展空間作為代價，這將對我國的產業自主昇級構成重大障礙。對比日本韓國的自主型“技術立國”戰略，我國發展路徑的弱點就看得更清楚了：我們在成為世界製造大國的同時，缺乏推進產業和技術自主進步的能力和意志，即缺乏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核心能力。

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國高層經濟管理部門和科技、產業管理部門，在開放引資和技術進步產業昇級方面，長期沒有形成協調一致的戰略指導思想。二是我國主流經濟學界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過分迷信“比較優勢”和“拿來主義”，將無限制地吸引外資作為促進增長、就業和產業昇級的第一法寶（實際上，引進外資也不是引進技術的惟一途徑）。不破除這種懶漢哲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話。

中共十七大報告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優化昇級”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優先措施，絕非偶然。

外資企業是不是自主創新主體？這成了“正確處理對外開放

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係”的又一爭論焦點。

在通行全球的資本主導權和知識產權規則下，外資企業不可能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資本無祖國”是哄小學生的空話。我國加入WTO後，“市場換技術”越來越難實現，外商直接投資帶動技術進步的邊際效益遞減。用“外資帶進的設備越來越先進”說事，是缺乏基本的技術知識。技術的生命力在於持續的進步。一個企業或行業的技術實力的本質是自主技術進步的能力，而不是買了多少設備圖紙專利。根據創新經濟學理論，技術進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組織內生地發展出來，而沒有任何組織之外的力量和過程可以替代，因為“技術”不僅體現在物質產品上，更體現於企業或科研組織長期工作積累形成的經驗、程序與慣例上。一國企業技術能力的總體，決定了國家經濟活動的範圍、性質和在國際上的地位。“一個國家進行技術學習的主體只能是該國的組織，而從創新中發展起來的技術能力也從而具有國家所屬的性質。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的分支組織……活動的範圍和性質以及獲得收益的分配都服務於母公司的戰略目標和控制”。²² 滿足於依靠外資端來現成的“先進技術”，甘心當洋人的打工仔，躺在“低工資比較優勢”上再吃20年的“人口紅利”……這不是“以人為本”，是“以外資為本”。

“真正先進的技術是引進不來的，我們見多了打著‘引進技術’旗號與外資合作的國有企業走向失敗的例子”，科技工程界的這一呼聲多年來不絕於耳，但我們的經濟學家就是聽不懂。

依靠外資推進中國產業昇級和技術進步的幻想，既是出於對技術的無知，也反映了我國開放以來一個明顯的社會思潮，即躲

²² 路風：《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2頁。

避艱苦的自主創新、把國家建設和產業振興的前途託付於外人的傾向。堅持獨立自主，在以我為主的基點上開放和吸收學習，這是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國策。鄧小平說過：“任何外國也不要指望我們做他們的附庸”。²³ 一個老想著依靠別人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國家的精英層，如果僅僅對眼前的財富增長感興趣，沒有振興國家的抱負和遠見，就沒有資格充當社會的精神領袖，最終會被歷史拋棄。

我國力求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但市場經濟國家也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是日韓式的自主型技術立國？還是拉美式的依附型發展？有西方觀察家認為：可以把中國“視為一個正在出現的‘正常’的工業強國，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樣”，而這正是“美國戰略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

（中國成為經濟超級大國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第一，中國的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的出口是由外國公司而不是中國企業在主導。第二，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從……工業發達國家進口的設計、關鍵性元件以及生產設備等。第三，中國企業幾乎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廣它們進口的技術，從而使得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中的有力競爭者。

中國企業落後於外資企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它們沒有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作長期投資。……特別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夠而且經常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縱經濟政策。……如果不對相關體制加以改革，中國吸收、發展和推廣科技的能力仍將受到限制。大多數中國企業仍將在全球工業生產鏈條的低級環節上為了微薄的利潤而相互競爭。²⁴

²³ 鄧小平：〈在中共 12 大開幕式的講話〉，《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彙編》，第 260 頁。

²⁴ 喬治·吉爾博伊：〈中國奇蹟的神話〉，美國《外交》雜誌 2004 年 7、8 月號。

日本媒體亦有如是觀點：

中國企業只是關注使用外國技術，依靠低成本生產產品，而不是全力開發自主技術。……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著眼點是引進外資、增加就業、擴大出口，沒有更深地考慮如何扶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中國企業，以及如何加強它們的競爭力。……如果中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市場也被外資逼入困境，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²⁵

3、引狼入室的“改革攻堅戰”：無底線開放危及國家安全

我國加入WTO後，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觸角從下游工業向上游延伸，伸向我國裝備工業的核心部分，並向農業、²⁶ 流通（物流）、²⁷ 金融、²⁸ 諮詢服務、²⁹ 公用基礎設施³⁰ 等領域滲透。

²⁵ 〈中國國家昌盛而民族工業走向衰亡〉，日本《選擇》月刊 2008 年 1 月。

²⁶ 耳熟能詳的例子是，美國誘騙我國豆油加工企業在價格頂點購買美國期貨大豆造成鉅虧，跨國糧商趁機併購控制我國大豆加工企業，也就是控制了大豆收購渠道，使我國大豆生產和加工業遭受毀滅性打擊。跨國公司在我中部地區悄悄收購基層糧站，是值得重視的新動向。

²⁷ 中國連鎖店前 30 家佔全社會消費零售額的 9%，其中前 15 名中有 11 家外資超市。國際 50 大超市採購集團中三分之二進入中國，已完成在各大城市和二線城市佈點。地方政府提供銀行貸款，放任外資超市交叉補貼等明顯違規行為。我國輕紡工業競爭激烈，大型零售鉅頭得以利用規模優勢壓榨輕工業利潤。

²⁸ 至 2006 年 9 月，國內被外資參股控股的金融企業共 67 家，涵蓋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託公司等所有領域。我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四家已成為合資銀行，外資股權接近 25% 上限，其他股份制銀行、地方商業銀行大部成為中外合資銀行，前十名保險公司的五家已合資。IBM 目前同時壟斷我國銀行業大型機市場和大型機服務市場，使我國金融運行存在較高安全隱患。

²⁹ 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安永）等獲准在華設立合資事務所。2001 年證監會規定：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補充審計，部分銀行也發佈類似規定。全國工商聯 2006 年向人大提案：四大所“幾乎壟斷了我國海外上市企業的全部審計業務……大量國家重要信息已處於開放狀態，國家安全令人擔憂”。

在一段時期，我國各機構、各地政府對跨國公司在華戰略性滲透沒有任何防範意識，反而爭先恐後地、無限制地、無對等條件地拉外國“戰略投資者”前來參（控）股，全然不顧國家經濟命脈的安全。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國企攻堅戰”時期，一些地方政府為完成地屬大中型裝備類國有企業“限期改制”任務，紛紛把“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作為首選方案。這些國企不少是原部屬行業骨幹企業，屬於我國工業體系的核心部分。從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這些國企都是包袱，對地方GDP貢獻小、債務負擔和人員負擔重，“民營企業買不起，讓其他國企收購等於沒改”。引進“世界五百強”來當“戰略投資者”又卸了包袱又有政績，一舉多得。這一“改革思路”，等於白送給跨國公司消滅競爭對手、擴大在華地盤、壟斷中國市場的機會。³¹ 一些行業排頭兵企業被

³⁰ 城市供水和污水處理：2002年對外資開放。世界四大水務集團（蘇伊士、泰晤士、威立雅、柏林）染指中國，蘇伊士在參股15個城市的自來水公司，法國通用收購上海自來水浦東公司50%股權、法國威立雅獲得深水集團45%股權。城市政府“盤活存量”籌集城建資金。洋水務看準壟斷型公用事業私有化後向政府談判的優勢，推水價上漲，掏消費者腰包。

³¹ 例如，徐工機械：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排頭兵企業，在20個品種銷售額佔國內前三位，汽車起重機、壓路機佔國內50%。徐州市和徐工機械上級（徐工集團）改制方案，同意由美國凱雷（基金）以20億元代價，對其核心子公司徐工機械控股82%。後因輿論反應強烈，中央重審叫停。

瀋陽機床：數控機床國內市場佔有率約28%，躋身世界機床行業十強。2006年瀋陽國資委將該集團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讓49%股權。尚未有成交報導。

西北軸承：原鐵道部定點廠，2001年整體與德國FAG合資，德方持股51%。德方資金不到位、佔據關鍵崗位、大量裁員，經營每況愈下。2003年，西軸將所剩股權全賣給德方成為獨資公司。一家大型骨幹企業就此丟了品牌，退出25%的鐵路貨車軸承市場。

外資收購後，給行業級協同技術攻關造成沉重損失。³² 甚至一些承擔國防工業重要配套任務的戰略性企業，一度也面臨被外資吞併的前景。³³

現存不多的國有重點企業，是我國 60 年建設起來的工業體系的核心部分。這些企業的意義，遠遠超出賬面的“資產”，而是綜合國力的核心——企業組織、技術研發與產業核心技術、熟練技工隊伍、品牌與行銷等等能力的集合，是行業內配套體系的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業自主創新的帶頭人和產業昇級的戰略支

³² 例如，大連電機廠：曾是我國最大的電機企業，大連第二電機廠曾是起重冶金電機的排頭兵企業。1996、1998 年，兩廠分別與新加坡和英國企業合資，外商控制經營權後，連年虧損，最後變為外商獨資，一半職工下崗，費用仍由地方承擔。此前兩廠均承擔行業重要技術研發牽頭任務，合資後取消。

錦西化機：其透平分廠有一支通曉各國石化裝置的專家維修隊伍，國內獨家，多次承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國企改制，葫蘆島市同意西門子收購透平分廠 70% 股份，使錦西化機失去核心競爭力和惟一利潤點。

³³ 例如，杭州齒輪廠：全國齒輪業第二，船用齒輪箱和工程機械變速箱國內第一，知名品牌，掌握多項國家行業技術標準，承擔艦船、裝甲車等國防科研任務。2002 年某外商要與杭齒核心能力合資被拒，外方稱“不讓控股就不來杭州投資”，蕭山區同意外方控股 70%。後因中央干預叫停。

軸承行業：至 2005 年，跨國公司在大陸已建立 24 家合資軸承廠，8~9 億套能力。行業龍頭哈爾濱、瓦房店、洛陽三大廠，產量佔國內 15%，掌握行業前沿技術，基本包攬了軍工、鐵路車輛、重大機械裝備的配套研發任務。因經營困難，三大基地分頭與外資談判合資，經軸承協會呼籲暫停。

武漢鍋爐廠（工業鍋爐）：曾承擔我國某戰略武器核心設備的配套研製生產任務。2007 年，上級單位將所持 51% 股權轉讓給法國阿爾斯通。為完成改制“政治任務”，同意法方苛刻條件。新武鍋軍工研製和生產任務必須通過外包，看洋人眼色。

武漢長江動力和杭州汽輪機：2005 年，長動（工業汽輪機）被西門子以 3.4 億人民幣控股。該產品是石化電力等工業重要基礎裝備和國防動力設備。1975 年，西門子曾將整套設計製造專利賣給杭州汽輪機廠，杭汽消化吸收後，市場份額穩步提高，價格低於西門子 30~40%。西門子控股長動，意在利用我國相關企業的分散弱勢地位，分頭打壓擊破，對行業上下游和使用部門造成威脅。

點。一些關鍵企業一旦被合資，產業鏈就發生斷裂，造成全局性的損失。

1990 年代緊縮時期，外商對華投資呈爆發式增長。這同時也是“國退民進”高潮期。如果再來一次招商引資和“國退民進”高潮，我國的工業體系就真的要傷筋動骨了。

放手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搞“改革攻堅”的主張，不管理由多麼動聽，他們忘記了一點：國家產業進步和經濟安全，是人民根本福祉之所在，是最高位的“大道理”，改革開放必須服從這個大道理。西方給我們扣“經濟民族主義”的帽子，其實這頂帽子應該給他們自己。美國在上文所述的所有領域，都嚴格限制外資准入，其安全審查機制之嚴密，世界罕見。³⁴ 1980 年代的英國私有化和 1990 年代的前東德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也從未允許任何重要的國有企業出售給外國人。西歐各國工業中外資比重不超過 15%，在銀行業中的外資比重不超過 13%。只有阿根廷和若干東歐國家，國企私有化是徹底向外資開放的，其喪失經濟主權的嚴重後果已明擺在世人面前。

這種“改革思路”的一度流行，讓人懷疑某些改革“參謀”們是否具備稱職的判斷力和職業道德。似乎只要能讓國企“退出”，怎麼幹都沒有心理障礙。加入 WTO 條款“允許”外資購買某行業股份，被偷換成來者不拒的“必須”。揭露批評外企劣跡，是“反對開放國策”。“不能用自主創新壓制改革開放”、“計

³⁴ 1980 年代，美國國會通過《綜合貿易和競爭法》，規定成立由財政、外交、商務、國防、司法、安全、科技等 12 部門組成的“外資審查委員會”，負責調查評估外資在美併購的安全威脅，並授權總統可中止該併購案。此後對外資併購的限制漸趨嚴格，範圍延伸到“本國重要基礎設施”——農業及食品、水、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服務、能源、銀行及金融、化工及危險材料行業、郵政、信息技術等，以及核能、國內航空和航運（禁止）、電信、廣播（嚴格限制）、油氣管道、鐵路、採掘（對等投資）、土地及不動產、水電、沿海和內河航運（特殊限制）。

劃經濟導致封閉落後是真正的不安全、越開放越安全”等等歪理至今還在流行，似乎中國只有“融入全球化”一條路。

我們有必要就開放、發展和安全的關係，進行一次科普教育。

任何主權國家對外國資本都不可能實行完全開放。“融入全球化”是完全錯誤的口號。

所謂“開放”，是指一個自主系統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沒有與環境的互動，系統就會停滯和死亡。但系統與環境的互動必須有選擇、趨利避害。否則系統“融入”環境，也失去了生存權。我們今天遇到的，已經不是開放不夠的問題，而是在高度開放、安全形勢漸趨複雜的情況下，居安思危意識和防範機制不足的問題。

（三）我國外向型加工業發展道路已走到極限

近年來，全世界出口加工業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加上人民幣升值、工資緩慢上漲等長期因素，我國靠低工資優勢搞加工出口的發展道路，已走到極限。連續多年年增 10% 以上的“奇蹟”不可能永遠持續。世界金融風暴說明，靠美國人借債消費支持發展中國家出口，是無法持久的。世界經貿格局正面臨深刻變化，市場風險加大。中國有七億勞動力，是工業化國家勞動力總和的 1.5 倍。全世界輕紡市場也不是無限大的。

1980 年代，我國人均收入不過兩百多美元，沿海大循環是順應經濟規律的正確戰略選擇。但是要看到，發揮低工資競爭優勢是處在“窮國”階段，不得已受國際資本剝削的發展策略。今天我國人均 GDP 是 30 年前的 15 倍，已處在人均 3000~5000 美元的以結構昇級為主的發展階段，不能再一根筋地靠低工資“招商引資出口”過日子，到了推進產業昇級的時候了。一些拉美國家到了人均 3000~4000 美元後，長期徘徊不前，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所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昇級。這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³⁵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扭轉片面的“惟 GDP、惟招商引資”的發展思路，確立“從成本優勢轉向爭取技術優勢”的指導思想，也就是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為導向的戰略思想。保持當前經濟增長速度當然很重要，但更為根本的任務，是從現在開始著手，轉向內源型的、以自主型產業和技術進步為主的發展路線。改革開放政策，應該服從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戰略目標。

四、破除新自由主義迷信，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要正視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經濟政策的消極影響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改革開放的基本態勢是：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結構佈局調整基本到位，所有制結構和市場化程度大體合理。條塊體制、部分壟斷行業、初次分配領域需探索深化改革。在對外開放領域，我們在頂層設計方面，對如何掌握“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原則、“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大有改善餘地。

上文所述問題，儘管是經濟建設前進中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牽涉到經濟發展根本的戰略指導思想，關係到未來發展大局。尋根溯源，上述問題的存在，與風靡一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密切關係。

³⁵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1723頁。

歷史地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引入，在改革開放初期，曾起到了衝擊傳統體制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這一思潮在學理上的極端化、教條化，以及忽視國情社情、忽視群眾利益等問題逐漸凸顯，對經濟政策的消極影響也逐漸凸顯。

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的傾向性主張及消極影響主要是：

第一，關於經濟體制改革：近20年，來自美國的產權理論被奉為金科玉律，一些人無視我國國情和開放的國際環境的風險，把西方標準的“市場化”當作心目中的目標模式，甚至當作意識形態。宣揚“惟產權改革、惟市場化”，要“國有經濟退出全部競爭領域”，取消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片面突出“效率優先”，為了國企改革要“犧牲幾千萬工人”；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各種問題統統歸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改革的問題只能用深化改革來解決”。總之，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才是“人間正道”，才是“萬應妙方”。極端的意見則反對政府在一切領域的干預（宏觀調控、產業發展政策）。

第二，關於對外開放：只講全球化機遇，迴避全球化風險，傾向無限擴大開放（放開金融自由化、外資併購國企）；模糊“引進外國資金技術增強本國競爭力”初衷，將開放政策簡單等同於“引進外資”，“讓外資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對中國產業進行重新整合”；鼓吹民族產業虛無論，宣揚“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跨國公司無國籍、在中國生產僱人交稅的就是中國企業”、“中國企業產業叫外國企業打垮活該”。

第三，關於經濟發展模式：主張市場決定一切，無條件照搬“比較優勢”論和“市場推動產業自然昇級”假設；沉醉於眼前外向型工業高速發展的成果，反對政府的適度干預和產業政策；

散佈“技術全球自由流動”幻想。

30年來，中央一再強調“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這些基本原則對一些人來說是耳旁風，他們關心的，只是不惜一切手段，推進全盤私有化、市場化。

片面強調市場化的改革觀和片面依靠“比較優勢”和外資的發展觀是出於同一個“市場萬能”邏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不設防的“市場化”，和放棄獨立自主的依附型發展道路是沒有本質區別的。

（二）解放思想，要從基本國情出發，要服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

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廣泛，實際上成為新的思想僵化。貫徹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必須正本清源。在新的發展階段，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破除“完全市場化”迷信和“融入全球化”迷信。

1、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我國現實國情、從我國國際環境和國家建設的基本任務出發，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原則。

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人多地少、資源緊缺、地區差距極大。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先進國家相比，經濟技術實力還差得很遠；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主體任務已完成，但市場秩序與政府治理秩序的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在西方資本的強勢競爭下，進行改革和建設的。

社會主義的最基本原則是追求最大社會公平。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環境中，在我國人均資源高度緊張和社會差異鉅大的情況下，走“完全市場經濟”道路勢必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造成社

會分裂。節制資本權力的過度膨脹，更多關注勞動大眾利益，是處理公平和效率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現實需要。³⁶

社會主義的歷史合理性還在於：以政權力量掙脫列強控制、消滅買辦官僚資本，建設自主工業科技體系，告別百年積弱。我們搞改革開放，歸根結底是為了讓國力更加強盛，讓大多數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也就是鄧小平一再強調的“三個有利於”標準（有利於生產力發展，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今天，國內競爭早已國際化，我國企業面對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國際大資本。我們要利用全球化機遇加快建設步伐，但也不能在西方資本的強勢競爭和對我國經濟主權的侵蝕面前解除武裝。如果輕信他們的誘騙，走“完全市場化、融入全球化”的道路，我們將重蹈阿根廷和東歐的覆轍。如果走到這一步，就是對獨立富強的建國理想的背叛，對中華民族百年奮鬥史的背叛。

2、兼顧基本工業化和產業昇級兩重任務

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國處於基本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階段，同時又面臨產業結構昇級的緊迫任務。兩者必須兼顧。

一方面，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基本工業化城鎮化，解決基本就業問題和農業現代化問題，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關照基本民生，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另一方面，從國家生存與長遠發展的需要出發，必須大力推進產業優化昇級。下決心通過 10~20 年努力，形成我國在若干中

³⁶ “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費的資源比發展中國家多 30 多倍的基礎之上的……對於一個外圍國家而言，中產階級按照發達國家現實而要求去肯定自身的權力利益要求，則必定會產生對於平民階層的最低利益要求的排斥……激化社會矛盾”（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香港傳真No.2008~75）。

高端產業的技術優勢，佔領相當市場份額。掌握各核心領域的技術動態、緊緊跟蹤世界前沿技術，這是在世界資源、能源日趨緊張的條件下，掌握未來經濟持續發展主動權、避免受制於人的根本，是解決工業發展、人口增長與環境生態容量矛盾的根本。爭得產業昇級的自主權，也是解決中高級人才就業的必由之路。

基本工業化任務可以主要靠市場化、外向化途徑實現。產業昇級任務則面臨西方的強勢競爭、技術遏制和產權滲透，由於自主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尚未形成氣候，在現有過分開放的市場環境和過分軟弱的行業管理能力條件下，產業優化昇級難度很大。這是一個包括體制和政策調整、需要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的爬坡過程。我國將處於一個艱難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期。

國際市場容量有限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出現對我國出口型工業的遏制傾向，這可能影響對我國城鎮化進程以及城鄉關係演變趨勢的判斷。政策思想是否要做相應調整，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三）深化改革要適應新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任務

面對以上基本國情和基本任務，首先必須堅持“為多數人服務”和“確保國有經濟主導地位”這兩條社會主義原則的基本底線。要處理好以下幾類關係：

效率與公平：更多注重民生，節制大資本勢力。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不可能有公平正義和諧，也不可能有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

公有制主導與多種經濟成分競爭：要全面認識國有企業的戰略地位和國家保有對基礎與戰略性產業的控制權的必要性。我國各行業現有國有骨幹企業和國有科研技術體系，集中了我國 70% 以上科技人才和資源，是國家產業優化昇級的基礎，自主創新的中堅，

國防安全的屏障，³⁷ 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³⁸ 國家保持對戰略性核心產業的控制，是抵禦外資強勢競爭、保持國家穩定的基礎。

改革 30 年，國有經濟改革的主體任務已大體完成，現在深化改革的思路要偏重制度建設。要通過改革“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³⁹ 在市場化的環境下，我們有條件通過改善管理、加強監管和內外監督機制，鞭策企業提高競爭力。條塊問題、壟斷問題需根據具體情況，逐步穩妥地解決。

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市場和計劃都是資源配置的工具，互相補充，缺一不可，不應該意識形態化。要清算政府計劃虛無論。當然，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遏制腐敗、改善官民關係。

我國工業的整體競爭力尚未具備與西方工業“放手一搏”的能力，政府的產業政策是不可缺少的。在發達國家，工業處於技術進步前沿，佔據全球產業鏈高端，鉅型企業居於世界領袖地位，自然具有行業協調的能力。美歐通過政府組織大型科技項目（如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尤里卡計劃）、對航空航太等高端產業進行直接科研補貼或軍事採購等間接補貼，以爭奪前沿產業的競爭優勢。日本韓國的產業支持政策，推動了本國製造業、信息產業的

³⁷ 有人曾經提出“國家只需保留軍工企業”，言外之意其他國有企業都可以私有化或讓外資控股。他們不瞭解，只有使國防建立在牢靠的國家整體科技工業基礎上，實行“軍民結合寓軍於民”，才能保持國防科技工業的活力和工業結構的彈性，優化資源配置。國家的重化工業本質上是國防實力的組成部分。

³⁸ 〈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1036頁。

³⁹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彙編》，第1725頁。

崛起。後進國家的產業政策，目的是對處於幼稚狀態的戰略性產業進行適度保護和支持，是追趕先進、推動本國工業昇級不可缺少的手段。產業優化昇級必須走政府規劃和市場結合、開放和自主創新結合的道路。國家要對產業昇級進行具體的指導和管理，如產業規劃、配套、運行協調、技術攻關推廣等。

推動自主科技創新，發揮微觀活力和政府指導同樣重要，要扭轉只強調“微觀效率是惟一創新源泉”的片面性。科技體制的改革方向是建設“以企業為主體，官產學研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這要和建設“有政府指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二者有機結合。

開放性與自主性：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開放政策要服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利益，以我為主，平等互利。要清算“融入”論。要正確理解開放、發展和安全的辯證關係，開放必須有“度”的把握，即以不損害國家主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底線。開放要為未來的產業昇級預留空間。要警惕“特洛伊木馬”式的威脅，警惕國際經濟和金融風險。

實事求是、為中國大多數人利益服務，是解放思想的基本宗旨。

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決非只有“計劃經濟”和“完全市場經濟”兩種選擇。1990年代蘇聯東歐劇變後“歷史終結論”在全世界一度甚囂塵上，似乎世界只能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一條路，現實證明了此說的幼稚虛妄。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設計，必須以我國未來發展戰略的需求為依據，而不是以哪個西方“本本”為依據。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前提、堅持“三個有利於”原則。我們的開放，必須堅持內外統籌、平等互利，以服從國內發展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筆者認為，這是和主張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走依附性發展道路、惟西方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根本區別。